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比喻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

要做好『加減乘除』

2015年3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吉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不能再唱工业“一柱擎天”、结构单一的“二人转”，要做好“加減乘除”。

“加減乘除”是人们熟悉的数学知识，是日常生活离不开的四则运算。做好“加減乘除”，是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把脉东北经济，为激发老工业基地新动能、推动东北振兴开出的药方。用“加減乘除”比喻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的路径，深入浅出、寓意深刻，为新形势下的东北经济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东北肩负国家“五大安全”职责使命，东北振兴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来，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压力加

大。习近平总书记用做好“加減乘除”四则运算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破题。加：投资、需求、扩张；减：淘汰落后产能；乘：创新驱动；除：市场化程度。加法和减法重在结构调整，乘法和除法重在改革与创新。通过改革创新促进结构优化，激发经济活力和内生动力，这是破解东北发展难题的重要举措。

加法是学习四则运算的起点，但一个相对复杂的运算就不仅仅是只做加法。“现在加法多，其他少，亟待补课。这个问题不解决，老工业基地难以凤凰涅槃、腾笼换鸟。”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把脉东北经济后作出的深刻分析和判断。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减法”“乘法”“除法”相对做得不够，一些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还很突出：东北地区经济结构较为单一，以工业为主，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相对不高。工业中资源型、重化型等传统工业占比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不足，大部分传统产业附加值偏低，整体经济“含金量”不高。新一轮东北振兴在做好加、减法的同时，更要做好乘、除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形成一个同市场完全对接、充满内在活力的体制机制，是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治本之策。要治本就要通过体制改革塑造制度红利，优化经济结构，提升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活力、内生动力和整体竞争力。

新时代加快推动东北全面振兴，需要“加減乘除”一起做，打好四则运算组合拳。既要优化“加法”的“长板”，更要补齐“减法”“乘法”“除法”的短板，让运算更合理、更均衡。做“加法”，加大有效投资的力度，既顾当前又顾长远，改善结构、扩大消费，实现经济发展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做“乘法”，减少低端和无效供给，降低实体经济成本，为经济发展腾挪出更大空间。做“乘法”，强化创新驱动，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布局未来产业，发展东北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更多新增长点。做“除法”，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市场激荡“一池春水”。

做好“加減乘除”，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既适用于东北，也适用于全国。新时代新征程，东北持续推进“加減乘除”，今年年初以来，“尔滨”出圈、吉林“全域开花”……东北展现发展新气象。在转型中突破，在蝶变中成长，东北老工业基地将奋力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新路，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谱写东北振兴新篇章。

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

——读习近平总书记《共同努力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 邓佳

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2017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强调“各国要同舟共济，而不是以邻为壑”。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法全球治理理论论坛上再次强调要“共同努力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2021年至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全球倡议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为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这些重要论述和举措一脉相承，聚焦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时代课题，集中展现了对于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刻阐述：当前国际形势下，各国应采取共同行动、应对共同挑战。

系统把握人类发展面临的全球性挑战

如何看待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进行了深入分析。一方面，“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另一方面，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由西方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及其引发的各种矛盾尚未得到合理解决，使得各种全球性问题相互交织、叠加，演变为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如何系统把握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发展正面临“四大赤字”：一是“治理赤字”，全球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持续不断，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难民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保护

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全球治理体系和多边机制受到冲击。二是“信任赤字”，国际竞争摩擦呈上升之势，地缘博弈色彩明显加重，国际社会信任和合作受到侵蚀。三是“和平赤字”，人类今天所处的安全环境仍然堪忧，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恐怖主义仍然猖獗，不少国家民众特别是儿童饱受战火摧残。四是“发展赤字”，逆全球化思潮正在发酵，保护主义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四大赤字”是对全球性挑战的深刻概括，是我们当前密切关注国际形势、有效防范各种风险的重要依据。

为国际社会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指明方向

为应对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带来的全球性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公正合理、互商互谅、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的四大理念，呼吁各国携起手来、积极行动，共同应对挑战。

首先，破解“治理赤字”，须坚持公正合理，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这一重要论断不仅是对全球治理现状的深刻洞察，更是对解决全球治理问题的明确指引。只有坚持公正合理，才能确保各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平等地位和权利。对此，习近平总书记重申支持多边主义的立场：“我们要继续高举联合国这面多边主义旗帜，充分发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欧盟等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的建设性作用，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次，破解“信任赤字”，须坚持互商互谅，增进各国之间

的对话协商。信任是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的基础，互商互谅是建立信任的有效途径。通过互商互谅，各国可以更好地了解彼此的立场和关切，增进相互理解。具体而言，各国应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兼顾，构建命运与共的全球伙伴关系”；秉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加强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加深相互理解和彼此认同，让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互信互敬”。

再次，破解“和平赤字”，须坚持同舟共济，营造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平是人类的事业，需要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以合作谋和平、谋稳定，以合作促安全、促发展；摒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思维，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以邻为壑、损人利己，一起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世界长久和平。

最后，破解“发展赤字”，须坚持互利共赢，共享发展机遇。发展是世界各国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想实行“脱钩断链”，构筑“小院高墙”。事实证明，这些做法是短视和危险的，只会阻碍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为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让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发展成果，我们积极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包括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必要改革、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助力世界经济增长、实现共同发展。



施蛰存笃志好学，有着学开“四窗”之誉。东窗指代中国文学、历史和东方文化研究，南窗指代文学创作，西窗指代外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北窗指代金石碑刻和书法文物的研究。

要从事创作，必须真能爱好文学

施蛰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感觉派”主要作家之一，以写心理分析小说著称。年轻时他就向往文学，1926—1930年，他与戴望舒、刘呐鸥等“毫无出版经验的青年”，为了发展“文艺事业”，相继创办了《璎珞》《文学工场》《无轨列车》《新文艺》四本杂志，以及第一线书店、水沫书店、东华书店三个书店。这一时期，他个人撰写了包括《上元灯》《追》在内的多部小说，开启了文学创作生涯。

早年间编辑出版活动，让施蛰存积累了丰富的编辑经验，也为他构建了明确的文学发展方向。1929年后，他开始学习、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也开始了和鲁迅的接触，随后一同出版了“科学的艺术丛书”。这一阶段，施蛰存十分敬重鲁迅的艺术鉴赏力，也很欣赏他的文章。1932年11月施蛰存主编的《现代》为鲁迅的“北平五讲”开辟专栏。1933年2月施蛰存因为“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在《现代》冒险刊发了当时其他编辑部不敢刊发的纪念左联五烈士的文章

学开“四窗”，内外贯通

——文学家、翻译家施蛰存的治学之道

□ 李小珊 汤涛

《为了忘却的纪念》。施蛰存经常给鲁迅写信约稿，即便后来两人因新旧文学问题展开了“笔战”，还是发表了鲁迅的很多重要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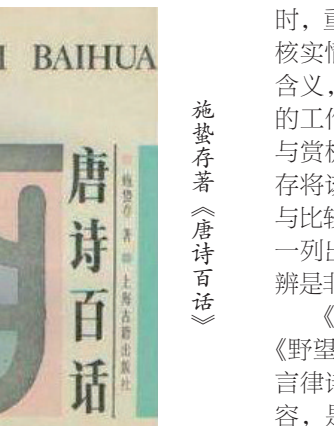
施蛰存曾在《爱好文学》一文里谈到了他热爱的文学事业，他批评作家盲目创作和靠旧名气生活的现象，得出结论：其一，对文学的感情只是成为好的创作家的一小部分因素；其二，热爱文学的情感应该成为提高文学修养的动力。他指出，多数青年若能对国家社会供给他所学习的专门技能，而把他们爱好文学的感情好好地保持着，用之于欣赏、评判别人的文学作品，使文学出版界慢慢能提高其水准，这是最完善的爱好文学的态度。如果一个青年要滥用他爱好文学的感情，以为自己有了这种肤浅的感情就无异于有了可信的创作能力，于是抛却了他应该学习的专门技能，而从事于写作，结果常是碰到了失败。他主张，爱好文学，不一定得从事创作；要从事创作，必须真能爱好文学。

治学的“三个阶段”

施蛰存认为，治学需要一个过程。他在《我治什么“学”》一文提及：“任何人都不会一上手就研究一门学问，必须有一个逐渐走向研究工作的过程。”施蛰存将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积累。对某一门学问开始感兴趣，逐本找这方面的书来阅读，由浅尝到博览，熟悉这门学问各方面的情况。第二个阶段是

“入门”。在更广泛的阅读与思考之际，必然会发生问题。有了问题，就要自己去求解决。第三个阶段才是做研究。“入门之后，你会觉得欲望不能，索性把一切弄不清的问题弄弄清楚。”施蛰存的“三个阶段”说和王国维的“治学三境界”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共同道出了治学的真谛。

施蛰存自束发之年就博览宋词，20世纪60年代，他顿然发现词学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但当代的词话、词论很少，于是着手从事相关研究，大量阅读词集、钻研学词方法。他披沙拣金，抄写历代词籍中的序跋、凡例。“晚上，在家里，就读词。四五年间，历代词集，不论选本或别集，到手就读，随时写了些札记。对于此道，自以为可以说是入门了。”这些札记多言简意赅，集考据、感悟于一体。当时，宋代之前的词作是词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施蛰存借以深厚的根柢为唐词、五代词的研究补白，将日积月累的词札整理成文章。例如，《读李白词札记》以广征博引的笺评对伪托作品提出质疑，从文献学求其真的标准，为词学研究提供了直接的研究材料。再如，《读温飞卿词札记》《读冯延巳词札记》把多位词人的词作串联在一起，分析风格的继承与流变，以其独具慧心的鉴赏将其蕴含的隐微曲折呈现出来，可谓新见层出。正如文学评论家徐中玉所言，“蛰存先生知识修养面极广”，“旧体诗词、文言文、小考证，均言之有据、有理，坦说所见，



决不苟同敷衍，文词则清新俊逸，有诗情韵味，一如其人”。

突出的治学方法：“考证与比较”

施蛰存挚爱中国古典文学，其诗词学研究成果斐然。他的《北山楼词话》近百万字，第一个板块为“名义”，即对词学相关的名词、术语的定义加以考辨，此乃开宗明义，当置于卷首。对此，施蛰存说：“我的第一道工序是弄清楚许多与词有关的名词术语的正确意义。我发现有些词语，自宋元以来，虽然有许多人在文章中用到，但反映出来的现象，似乎各人对这个词语的了解都不相同。我用了一点考证功夫，把几十个词学名词整理了一下，以求得正确的概念。”施蛰存对词学名词释义的研究在词学史上影响深远。

施蛰存在着手写作《唐诗百话》

时，重申校勘工作的必要性：“为了要核实情况，从语言文字中求得正确的含义，我又不得不先做些校勘、考证的工作。”《唐诗百话》被誉为寓研究与赏析于一体的中国诗学名著，施蛰存将该书最显著的特点概括为“考证与比较”。他在分析每一首诗时，都逐一列出历朝历代注家的评说，对此明辨是非、鉴别真伪。

《唐诗百话》开篇讲的是王绩的《野望》。赏析这首清新朴素的唐代五言律诗的艺术风格、解析它的基本内容，是诗歌鉴赏的一般章法。但施蛰存在此基础上，具有更强的问题意识，他想弄清楚这首诗的写作时间。他博览诗话并选取了三家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对此裁断歧义、去伪存真，并结合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研究方法，考证出该诗歌作于隋朝政权将亡或已亡之时。据此，他更准确地提炼了诗歌的主题，揭示了作者以诗言志：遗憾于“徙倚欲何依”，只得“长歌怀采薇”。施蛰存将考据和比较的治学方法运用得驾轻就熟，他既不认可“摘句论诗”，也不赞同刻意苦吟，这促成了他的诗词治学风格：辨析析理、逻辑严密、明白晓畅、新奇灵动。

融会贯通，中西互鉴

施蛰存与著名学者钱钟书齐名，人称“南施北钱”。将他们相提并论，不仅仅因为他们是集文学家、翻译家于一体的学界泰斗，还因为他们都是学贯中西、通今博古的智者，持之以恒地为丰富中国文化而不断探索。

学人小传

施蛰存（1905—2003年），原名施德普，浙江杭州人，文学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曾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在文学创作、古典文学研究、金石碑刻研究、外国文学翻译等领域成就杰出，著有《唐诗百话》《词学论稿》《北山谈艺录》等。

施蛰存早年学习外国文学，接触到象征主义、意象派诗作，并创作了多首意象抒情诗。撰写《唐诗百话》时，他品鉴李商隐的诗歌，分析其创作手法近乎象征主义：“诗意已经朦胧得很，还愿加一个说明性的题目，留有余地，让读者自己去感觉，而不是理解。”因而，施蛰存主张从寄托的意义去探索诗人的隐喻。对于这种创造了众多意象的诗作，他用象征主义批评方法来分析，的确相得益彰。

在翻译外国诗歌时，施蛰存善于将域外的诗形和中国文化的本体相结合。他将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句“To an Isle in the water / With her would I go”翻译成“我欲和她同行/到一个水中央的小岛上”。达意、雅致的译文中，融入了《诗经》所蕴藉的中国古典文化。施蛰存还将叶芝的诗歌题目翻译成《柯尔湖上的野鬼》《木叶凋零》等，“野鬼”“木叶”皆是中国古典诗词中出现的物与景。

在近代之前，中西之学是在相对独立的形式下展开的。近代以降，情况有所改变，西学东渐以及中学所作回应，已成为中国学术发展无法回避的历史背景。施蛰存在推动文化互鉴上，超越了二元对立思维，可谓“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

